

增订本

拣尽寒枝

Caelum non animum mutant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增订本

拣尽寒枝

Caelum non animum mutant

刘小枫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拣尽寒枝/刘小枫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80-4109-4

I. 拣… II. 刘…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274 号

主持编辑: 陈希米

责任编辑: 王凤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10.125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记

在北大念研究生时，一位前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很幸福，可以全心全意读书，学到真正的学问……我们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太忙，超英赶美学苏俄……没有空闲念书。这位前辈当时跟我眼下的年岁差不多。回想起来，他这番话确有几分道理——转眼间，国家又忙起来，仍然是超英赶美，只不过学的不再是苏俄，而是“全球化”……要是我这会儿才到读书年龄，恐怕也很难全心全意念书。

我们那个时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读书，心思的确很单纯，可谓心无旁骛——不过，我的读书年代真的幸福得紧？

不见得。

无论读本科还是念研究生时，我都不大清楚什么书真正值得去细读，即便知道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的

书值得读，也不知道怎么读……实际上，我一直在不断自个儿摸索什么书值得读以及如何读——而且始终带着一个心愿：想要清楚知道，因现代性而支离破碎的中国学术思想最终在哪里落脚……种种经验和教训，余温犹存。

收在这里的文字，大多是我晚近十多年来做编辑工作的副产品，个别篇章在结集时有所增订。

刘小枫

2006年9月

目 录

- 1 前记

困学纪言

- 3 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个体学术
37 西方现代性中的“文化革命”
53 金钱、性别、生活感觉
75 基尔克果的复调言述
85 海德格尔与神学
93 德意志神秘派小识
109 哲学家——人类的“罪犯”？
119 《墙上的书写》编序
129 我读洛维特的经验
146 人类学的“欲望”与古典
160 施特劳斯抑或科耶夫
178 《斐多》中的“相”
200 柏拉图《会饮》译者弁言
219 圣人的虚静

编余偶拾

- 255 《德语诗学文选》编者前言
- 260 莱辛和他的神学文集
- 267 维兰德与康德
- 271 逻辑思辨与虔敬生活
- 276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
- 280 接触西方古典文明的“二渠道”
- 285 谁在读培根
- 288 跟随大师读大书
- 292 思想的历史沧桑
- 296 《论僭政》中译本说明
- 301 色诺芬的《会饮》
- 307 柏拉图义疏三书
- 314 弥久益新的《古代城邦》

困学纪言

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的 个体学术^①

每次出入祖国大门，在边检站填写出入境单，我都感到职业身份的尴尬。因为，在出入境单的职业分类中，找不到自己的所属项。勉强可以从属的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其他”过于暧昧，既可能有“有特殊任务者”（特务），也可能指“干特殊行业者”（贩毒）或“自由职业者”（投机暴发后坐吃而不山空），实在都不敢当。

出于无奈，我把自己归为“专业技术人员”，但心里总不踏实。我是“专业技术人员”吗？不错，在大学教学，同时“研究”些学问，可我没有固定专业，十余年来换了几个专

^① 本文据笔者 1996 年 9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和同年 12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接受客座教授聘职时的演讲整理而成。

业。更说不上有什么技术，显然不可以把识几门外文，能破读几本中西经书，知道一点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技术。尽管如此，从法理上说，我还是把自己归于“专业技术人员”为好。个人不可能去设立一门专业，得由国家的文教制度来设立。有了专业，便会有这项专业所要求的技术。我毕竟凭某个“专业”的学历在大学谋到一份职，领政府颁给的薪水，属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局监管，名义上还是国家科技干部。在香港，干这一行的人则素被称为“给皇家打工”。

若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回答是：做学问。但什么叫“做学问”？我修过文、哲、史、神学（据说均属所谓人文科学），也自修过社会学、法理学、经济思想和政治理论（据说均属所谓社会科学）。但这些并不能证明我在做学问。问一位自然科学家做什么的，他（她）会说研究天文、地理、生物乃至更细的专业：艾滋抗体、给排水系统、神经药物……反正不会说是“做学问”。

何谓学问？我的确搞不太明白。汉语思想学术的原祖孔夫子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他还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初看起来，好像学问只是个体的一种活的方式，但从古代的学问论来看，据说学问为“救时之弊，应时而兴”（《淮南子·要略》），这样，“罔”和“殆”不仅关系到个体的志趣或安身立命，也关系到生活伦常秩序乃至国家社稷安危。用现代话来讲，学问关涉典章制度安排、精神价值秩序、社会文化品质。倘若如此，则学不仅是问所不知，也关涉治道之术了。

这类知识可以称为科学吗？“搞”科学者也要学和问，为

什么他们不自称“做学问”？科举制的“科”倒像“做学问”的样子。光武帝诏令按“四科取士”，其中人文—社会知识和德行各占两科：“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刚毅多略”。如此看来，所谓学问与科学的不同，在于学问牵涉德行，而科学是德行中立的。但现代科学制度真的与德行无涉吗？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的规定取消了吗？如果没有，这种规定的现代化又意味着什么？作为个体的学者与国家的文教政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学与问都好像有些飘浮。

一 中国学问制度“不绝若线”

在中国古代的学问制度中，国家对学人的个体规定一直很明确：学而优则仕，成为国家统治体系中的官僚。学问是学而通治术，因此也是一种个人资产，有了学问而通治术，个体的生存位置就有可能改变。于是，学问是生存践履上有效的知识，由国家政权的文教制度规定、认可和支配。科举制是把个人的修学和德行转换成个人资产和社会权利的机制，亦是规约个人可做、能做什么学问的建制。清末明初的帝制转型之际，中国古代学问制度的正当性被据说“德行中立”的“西学”僭夺了。“西国学部之盛，中华企望而有怖心，尚已”（章太炎）。但“西学”是什么？是“德行中立”的吗？

在现代中国社会，科举制实际并未被废除，只是更换了修学内容、德行品质和学问建制：四书五经及其修身学被“西

学”取代，书院被大学取代，一套适应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文教制度建立起来。传统经学家认为：

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蒙文通）

的确，近一个世纪来，中国学问制度的嬗变是“西学”改塑科举的历程。然而，西学改中学并非蒙文通先生所谓妄以西学衡中学的结果，而是中华帝国改制的结果。大学堂的建立，因应于清末新政；民国建设时期随之进行了一系列学制改造，这是科举制的现代改制。五十年代，党领导的院系调整和思想改造运动完成了现代科举建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化改造，八十年代的学科调整不过是随国家理念的变动而修补这一科举建制，“德行高妙”、“学通行修”、“明达法令”的规矩同样很具体。这意味着，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才能拒斥西学；承纳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为了富国强国）而又拒斥西学，何以可能？即便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也要靠西学去拆除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正当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教制度经历过三次大的嬗变，并都与夷狄相关：晚周至秦汉，华夏王土经历过第一次改制危机，据今文家称，秦以西戎之裔妄斩三代文教之制，以致公羊子惊呼“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故有汉代博士制的改造和太子学的建立。魏晋之时，佛学东传，华

夏文教制度又受威胁，“浮屠老氏之教，逆与儒学鼎列于天下”（陆九渊），刺激书院的形成。晚清之时，东狄（日本）与夷（西方列强）交，中国文教制度又不绝若线，遂有新学兴起。历代新学的形成都是“应时而兴”，并没有把华夏国族的命运负担抛掉，而是应时地承担起来。与古代读书人一样，现代读书人的学问牵动着华夏王制的命脉，而现代科举建设与华夏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相应，仍是联结个体学问与国家治道的要津。现代中国学人要么在这一科举制中作官家言，成为国家的“科技”干部（学官），享有政府的种种福利；要么成私家言，在文、史、哲叙述中微言大义。但无论学人作私家言还是官家言，总与社稷治道时弊相关。政府则选择性地运用学人们的学问巩固国家权力，权杖不称意的“科技”干部。

如此看来，古今学问制度的实质没有不同，都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与国家意识形态（文教秩序）一体化。从制度层面上讲，西学入华，并没有改变传统中学的制度性质，而只是改变了具体的知识学科。现代式的中国学官制度仍配合有一套文教秩序，中国的文教秩序和学问制度岂可谓已经倒闭？近闻建立学术规范、提倡人文精神或再兴国学、或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喧嚷之声，似乎现代式的中国学问制度残破不堪，似乎华夏王土的学问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文教秩序遭西学冲荡一直未能得到重建。据说，在华夏王土成为民族国家的改制历程中，改制选择上的波折导致中国文教秩序和学问制度倒闭，而改制选择又受学问制度和读书人影响，因而，提出种种学术方略，重建已倒闭的学问制度或修改既存的学问结构，被看作是汉语学界重建华夏学问制度及其文教秩序的大务。我想问，这就是华

现代学问制度及其文教秩序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提倡学术自为者的心智努力难道不正是在进一步为国家权力服务？这与古代的学而术有何分别？

现代学问制度及其文教秩序的现代性问题究竟是什么？无论本土化派还是西化派，重建的努力都要参照西学。不妨就从这个问题开始：西学究竟是怎么回事？西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现代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关系？

二 现代学问题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学：何谓西学？

几年前，以“现代世界体系论”闻名学界的华勒斯坦（I. Wallerstein）教授组织了一个班子（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审察西方的学问制度。这个班子中有三位自然科学家（技术学、物理学、化学），三位人文学家（哲学、语文学、历史学），四位社会科学家（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政治地理学），依现存的学科结构的三大系统组成，好像三堂会审。经过近两年的工作，这个班子呈交了一份《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1995）。^①

报告书一开始就提出，“科学”[Science]一词只能界定自然科学的性质及范围，无法明确标识所谓学问的知识。学问的名称一直不确定，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圈传统中有不同的称法：诸如“文科”[Arts]、人文学[humanities]、精神科学[Gei-

^① 参 Wallerstein 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版，1997。

steswissenschaften] 或哲学。这表明, 学问知识由民族国体的文教传统滋养, 带有民族文化传统的胎记, 因而既缺乏内在凝聚力, 又难以具有普世性, 在与自然科学争夺知识原则的支配权时, 显得脚根不稳。自然科学的知识原则不仅发展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 而且声称能够建构支配生活世界的知识系统。自然科学之所以可以如此宣称, 乃因为自身有一套公理系统: 无论哪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学人, 对二加二得四的原理不会费神去争辩其有效性。

自然科学虽肇兴于泰西, 但亦与泰西带有民族胎记的学问传统冲突。不过, 自然科学又是建构或拓展现代民族国家最有力的工具。近三百年来,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 正是由民族国家的建构冲动支撑的。一国的富强以及在列国竞争中的位置, 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某一民族国家无论选择什么政治制度, 都得拥有自然科学的学官建制, 才能保障国家的强势。

可见, 自然科学不涉及政治和文教制度改制的正当性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 这两大问题仍是由学问知识来料理。于是, 在政治和文教制度改制正当性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方面, 就出现旷日持久的论争, 这些论争相当程度上是由带有民族文化胎记的思想和学问知识导致的。这样看来, 西学显然不等于近代自然的学问, 我不妨称之为现代学问体系。这一学问体系带有内在的不和谐因素, 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公理性和知识原则的普遍性诉求, 另一方面是带有民族个体胎记的思想学问的知识原则的民族个体性诉求。

现代学问体系只有两百年历史, 其社会—政治表现是大学

及其学科建制的形成。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的一百年，是欧美现代式大学建制的形成期，在此之前，自然科学已初步具有了自律的制度形态。据华勒斯坦小组的分析，大学作为制造现代知识和培育现代知识人的建制，一直是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或人文学）既携手又冲突的制度性场所：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携手消除神学一形而上学对知识原则的规导权，同时，各自又在谁该占有这个空出的知识王权位置的问题上争斗不休。学问毕竟是为“救时之弊，应时而兴”的，在这一百年间，欧美主要民族国家（英、法、德、意、美）的社会制度激剧变动，改制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要求知识界做出解答。社会科学由此产生了，从知识原则方面看，它是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或人文学）既携手又冲突的产物。

在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争夺知识原则的支配权的认识论冲突之中，社会科学究竟以谁的知识理念为基础经过了一番历史的论争。基于自然科学的认识原则，孔德提出了“社会物理学”的知识理念；另一方面，诸多学人基于传统学问提出了种种社会论述，社会知识域出现无序状态。泰西知识人看似比华夏知识人幸运，他们没有夷夏之分的纠葛；但泰西知识人也分属于各自的民族国体，民族国家的改制负担仍在泰西学问知识人肩上。^①显然，自然科学与学问知识的认识论冲突之中仍有民族国家的冲突因素。所谓英美与欧陆学术之别，欧陆学术中所谓德法之争，就是明显的例证，尽管我更愿意强调学术思

^① 参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编选，香港：牛津大学版，1997。